

※「《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的文獻價值」專輯※

《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經學部》初探

馮曉庭*

一、前言

《古今圖書集成》編成梓行於清初康熙、雍正年間，篇幅一萬卷，規模宏大，是一部「以類相從」的巨幅類書，全書由下述四大層級構成：

第一層：〈曆象〉、〈方輿〉、〈明倫〉、〈博物〉、〈理學〉、〈經濟〉六大彙編，彙編之下，又各收集「典」若干。

第二層：〈乾象〉、〈坤輿〉、〈皇極〉、〈藝術〉、〈經籍〉、〈選舉〉等三十二典，諸典之下，又編列「部」數若干。

第三層：部的總數為六千一百一十七，是《古今圖書集成》的最基本架構，各部之下可能又依照主題關涉及資料內容，敷設各項子目。

第四層：每部統攝「彙考」、「總論」、「圖」、「表」、「列傳」、「藝文」、「選句」、「紀事」、「雜錄」、「外編」等子目，作為鋪排史料文獻的方針準的。

整體而言，《古今圖書集成》蒐羅範疇廣博，涵蓋年代久遠，編排細密合理，檢閱方便容易，對於從事中國文化或者漢學研究的學者來說，可謂極具參考價值。

從學科分類的角度來看，《古今圖書集成》輯收內容與中國文哲研究範疇最為息息相關者，便是六大彙編之一的〈理學彙編〉。〈理學彙編〉下設〈經籍〉、〈學行〉、〈文學〉、〈字學〉四典，其中〈經籍典〉收錄了經、史、子、集四部相關史料，舉凡「帝王尊經」、「諸經傳注授受」、「諸子百家紀述」、「諸家評

* 馮曉庭，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驚之語」¹，都在蒐羅之列；換言之，諸般與歷代圖書典籍有所關聯的資訊以及文獻，盡皆排比於斯。

〈經籍典〉共計五百卷，可以區分為五大種類——首〈經籍總部〉（卷 1-50），次〈河圖洛書〉至〈讖緯〉等十九部（經部，卷 51-367），次〈國語〉至〈山經〉等二十九部（史部，卷 368-430），次〈老子〉至〈諸子〉等十三部（子部，卷 431-470），次〈集〉、〈文選〉兩部（集部，卷 471-496），次〈類書部〉（類書，卷 497-498），最末則是〈雜著部〉（卷 499-500）。

五大種類當中，以「經部」所錄篇幅最鉅，收錄〈河圖洛書〉、〈易經〉、〈書經〉、〈詩經〉、〈春秋〉、〈禮記〉、〈儀禮〉、〈周禮〉、〈三禮〉、〈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四書〉、〈孝經〉、〈爾雅〉、〈小學〉、〈經學〉、〈讖緯〉等十九部，凡三百一十七卷，較數量居次的「史部」遠遠多出二百五十四卷，如是的差異，除了說明經書以及經學研究自古便是學術發展的重心，相關史料文獻因而隨之廣博海淵以外，也顯示出《古今圖書集成》的編輯者對於經學研究相關資訊的蒐集與整理應該最為在意。基於如是的事實，筆者以為，設若針對這些篇章進行詳盡地討論暨分析，或許能夠獲致有裨於詮釋經書、闡明經義、疏通經學發展歷史的訊息與例證。

《古今圖書集成》既然是現存篇幅最為巨大、涵蓋範圍最為完整的古代類書，若能善加閱檢利用，申明其精良窳劣，必定能夠有助於學術的發展與探研。然而，自成書以來，相關論述卻頗為尠少，學者即便有所申論，也大多局限於作者、編纂、出版、流傳等外圍議題，甚少觸及書中內容，至於其結構當中所蘊藏的文化意義、時代觀點、文獻組架等環節，相關的探論則更是鳳毛麟角，實在難以真確地凸顯《古今圖書集成》的優劣，更無法賦予《古今圖書集成》適當的評價。

根據上述認知，以下便就該書〈理學彙編・經籍典〉項下的〈經學部〉為觀察中心²，略行鋪陳，希冀能藉此體現《古今圖書集成》所錄史料的結構與內涵大

¹ 〔清〕陳夢雷(?-1741)等編：《古今圖書集成・凡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193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膠版縮印」本），頁19b。

² 本文所徵引的《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經學部》原文，一概以《中國歷代經籍典》本（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1934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膠版縮印」本）為準，以下僅注卷、頁，不再重複著錄版本。

要，並披露若干蘊藏在《古今圖書集成》中的學術價值。

二、〈經學部〉的體制

〈經籍典〉所收的經部相關子目有十九項，全數是以典籍的名稱或類別做為劃分歸納的依據。就收編的子目著手觀察可以發現，由於抱持「以書為綱」的分類概念，〈經籍典〉的分類因而較一般正史〈藝文志〉或者〈經籍志〉中的類目細微。例如《宋史·藝文志》與《明史·藝文志》都合而為一的「禮類」，〈經籍典〉則分歧為「禮記」、「儀禮」、「周禮」、「三禮」四項，而「樂類」則歸入「三禮」項；《宋史》與《明史》的「四書類」，則分歧為「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四書」五個部分。

至於〈經學部〉所載錄的諸項典籍，於《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屬「論語類」，於《隋書·經籍志·經類》屬「論語類」，於《新唐書·藝文志·甲部經錄》屬「經解類」，於《宋史·藝文志·經類》屬「經解類」，於《明史·藝文志·經類》屬「諸經類」，於《四庫全書·經部》屬「五經總義類」。歷代學者研讀經書、深入經學、分析經學發展史所撰著參酌的漢代鄭玄(127-200)《駁五經異義》、唐代陸德明(556-627)《經典釋文》、宋代劉敞(1019-1068)《七經小傳》、元代熊朋來(1246-1323)《五經說》、明代邵寶(1460-1527)《簡端錄》、清代毛奇齡(1623-1716)《經問》，都是歸屬於〈經學部〉的書策。換言之，舉凡典籍所詮所釋並非針對單一經書而發、所論所敘為經學傳承流變的進程、所記所載為歷代經學家的生平事蹟，都是〈經學部〉登載陳述的範疇。另一方面，依《古今圖書集成》的編輯體例，〈經學部〉所收錄的文獻史料則被區隔為幾大部分，即「彙考」、「總論」、「傳經明儒列傳」、「藝文」、「紀事」、「雜錄」、「外編」等七項。

(一) 彙考 (卷 311-322, 頁 1498a-1505a)

根據載述內容，「彙考」又可以區隔為幾個類別：

1. 記敘歷代帝王(中央政府)與經學的關係：「彙考一」至「彙考三」(卷 311-313, 頁 1498a-1509b)

本類別以歷代帝王(中央政府)的經學政策為陳述主軸，自「漢文帝年間始置

五經博士」起，至「明成祖永樂十三年『《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完成」止，舉凡博士的建置、經書的表彰、文獻的徵求、經義的講論、經術的運用、經學的推廣、經典的刊行、科舉的規範、經注的完成，都在紀錄之列，對於學者查考歷代中央政府與經學發展的關係，極有助益。如漢代政府建置五經博士的始末，〈經學部〉便如是載述：

文帝□年始置五經博士。

按：《史記》、《漢書·文帝本紀》皆不載。按：《後漢書·翟酺傳》：「初酺之爲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

《注》：「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此言，不知何據。」

按：《注》雖云云，然《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中³刺《六經》中作〈王制〉。」《史記·儒林傳》：「申公、韓生等皆孝文時爲博士。」則酺言已有據，但〈本紀〉失載耳。

按：揚子《法言·學行篇》：「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

《注》：「書謂諸傳記之書，經謂《五經》。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已，故云世不尚。」（〈經籍典〉，卷311，頁1498a）

（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

按：《史記·武帝本紀》不載。按《漢書·武帝本紀》云云。按：〈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

按：〈劉歆傳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

³ 《史記·封禪書》原文無「中」字，《古今圖書集成》誤植。

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按：〈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經籍典〉，卷 311，頁 1498a）

五經博士正式建置於漢代，是無庸置疑的事實，然而確切的時間卻頗有疑義，一說是文帝時期，一說則是武帝時期。面對這樣的歧異，「彙考」除了忠實記錄、呈現文獻原貌、追索資訊淵源之外，更細加研判考訂，不但釐清了二說的根據與基本立場，也表述了兩件史事的關聯，同時更善盡了類書的職責，完盡地蒐羅相關資料，令查閱者獲得最為全面的訊息。

2. 記敘孔子暨孔門弟子的生平學行：「彙考四」（卷 314，頁 1510a-1516a）

本類別以孔子暨孔門弟子的生平學行為陳述主軸，徵引的史料為《史記》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以及《孔子家語》中的〈本姓解〉、〈終記解〉、〈七十二弟子解〉、〈弟子行〉等篇。「彙考」將正文與相關注釋全數照錄，不附考證或解說。

3. 記敘歷代〈經學部〉典籍：「彙考五」至「彙考十三」（卷 315-322，頁 1516b-1569a）

本類別以歷代〈經學部〉書籍為陳述主軸，呈現的史料可以區分為兩大部分。

(1) 歷代書目（「彙考五」，卷 315）

收錄正史類書籍《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後序》、《隋書·經籍志·經類·論語類》、《隋書·經籍志·經類·六藝總序》、《新唐書·藝文志·甲部經類·經解類》、《宋史·藝文志·經類·經解類》等篇章所錄典籍。除此之外，還收錄了政書、書目類書籍宋鄭樵(1104-1160)《通志·藝文略·經類·經解》、元馬端臨(1254-1323)《文獻通考·經籍考·經·經解》、明王圻(1530-1615)《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經·經解》、明焦竑(1541-1620)《國史經籍志·經總解》、明陳氏(?)《續書目》。

(2) 《經義考》（「彙考六」至「彙考十三」，卷 316-322）

除了撮編歷代書目中〈經學部〉相關書目之外，本類別最為特殊之處，便是鈔錄了清初經學家朱彝尊(1629-1709)編纂的《經義考》。關於〈經學部〉徵引《經義考》一事，有若干環節當行深入敘述：

其一，考察《經義考》的版本暨編刊過程⁴，可以知道，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朱彝尊辭世之際，《經義考》的梓行尚未竟全功，只完成了《易》、《書》、《詩》、《禮》、《樂》五類，直至乾隆二十年(1755)，始由盧見曾(1690-1769)補刊完帙。因此，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所據，應該是初刻未完的刊本。

其二，由於所據為未完刊本，「彙考」所錄也就並非完帙，僅〈易〉、〈書〉、〈詩〉、〈禮記〉、〈儀禮〉、〈周禮〉等六項。

其三，除了在〈經學部〉全數有所編錄之外，其他如〈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儀禮〉、〈周禮〉等部，也都按類分別排錄《經義考》相關文字。然而，各部所錄與〈經學部〉「彙考」所錄卻不盡一致，當中歧異，並非文字有別，亦非版本差池，而是編輯詳略不同。《古今圖書集成》編輯者於鈔錄之際，凡是〈易經〉、〈書經〉、〈詩經〉諸部，宋代以前著作全然不錄，自宋代起則悉數鈔錄；至於〈經學部〉，則所有書名按章照錄。另一方面，《經義考》原例，臚列諸書除舉作者、書名、卷數、存佚之外，倘有相關載錄、序跋解題，亦一併載錄，而「彙考」所輯，則宋代以後諸書，相關載錄、序跋解題全予刪節。之所以會有如此差異，想必是因為重複鈔撮徒耗卷帙、曠費時日，希冀閱檢者能藉互見得其全豹。

(二) 總論 (卷 323-326, 頁 1569b-1588a)

「總論」以歷代申論儒學與經學的文字為蒐羅主軸，舉凡議論儒學與經學的定義、陳述儒學與經學的傳承變革、評定經書經注的內涵與優劣、揭示研讀典籍的方法與態度者，都在編輯之列。一如「彙考」的第二部分，「總論」對於諸多文獻，採取的是述而不論的態度，至於文獻排列的方式，則大致依據經、史、子、集四部為綱，首經部《禮記·經解》、〈儒行〉等五書十五篇，次史部《史記·儒林傳·序》、〈太史公自敘〉等十七書二十六篇，次子部《荀子·儒效》等十四書三十篇，次集部明《薛瑄文集·讀書錄》、《王鏊文集·六經》等二書二篇，總計三十七書七十三篇。

⁴ 見吳政上：〈附錄一·經義考提要及版本介紹〉，《經義考索引》（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2年），頁1-5。

從上述的簡單統計數字中可以發現：

其一，「總論」徵引的文獻，多史、子而少經、集，重古人而輕近代，資料結構難稱健全，觀之頗有虛應故事之嫌，可謂〈經學部〉「總論」的一大缺失。

其二，「總論」所載文字，性質與「彙考」截然不同，「彙考」重真實，字句不遺、色色具全，是編輯的最重要原則；而「總論」載錄諸家意見，論難辯疑，頗見爭議，既無法全面登陸，何取何否，應當有所陳述，否則將會造成錯導，貽誤學者認知。

（三）傳經名儒列傳（卷 327-360，頁 1588b-1768a）

顧名思義，「傳經名儒列傳」所側錄的，就是歷代經學家的傳記資料，首錄相傳為《左傳》作者的左丘明，最末則錄清初經學家萬斯大(1633-1683)。「傳經名儒列傳」為〈經學部〉當中篇幅最為巨大的部分，所纂錄的文獻資料，絕大多數擷取自各部正史，倘若正史無載，則徵引自相關的方志、單篇傳記等文獻。

整體來說，「傳經名儒列傳」所援引的史料並無特出之處，然而當中有若干事項必須略作說明：

其一，檢覈《明史》總裁官張廷玉(1672-1755)撰寫的〈上明史表〉⁵，可以發現今本《明史》的纂成刊行，已在乾隆四年(1739)七月，上距《古今圖書集成》的完成，至少已三十餘年，很明顯地，陳夢雷等人所徵引的明人傳記，絕對不可能是今本《明史》。事實上，「傳經名儒列傳」所登錄的明代經學家列傳，當然不可能標識為《明史》，而是所謂《明外史》。《明外史》一書，有清一代諸家書目絕未載錄，顯然至少是一部流傳未廣的圖書。由於諸家載錄絕無，《明外史》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其淵源為何，乍看之下，著實難以測知。如是的困惑，今人衣若蘭〈《明史》稿本探研：從萬斯同《明史》稿到四庫本《明史》〉一文中的相關論述，可以全然予以析解：

附帶一提的是，《古今圖書集成》中的《明外史》，由於徵引明人傳記達七百萬字，從中加以考覈，亦能幫助我們釐清《明史》編纂的過程。楊家駱以

⁵ [清]張廷玉：〈上明史表〉，附錄於《明史》（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年），頁8629-8631。本文所徵引的《明史》原文，一概以此本為準，以下僅注卷、頁，不再重複著錄版本。

爲，其文多與王鴻緒據萬斯同稿改撰之「明史稿」先後二本合，而往往加詳。且陳夢雷於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完成《古今圖書集成》，當時王鴻緒史稿尚未成書，所以陳夢雷所據之《明外史》，當爲萬斯同的「明史稿」。⁶

《明史》的纂成，經歷清初康、雍、乾三朝，萬斯同(1638-1702)、王鴻緒(1645-1723)、張廷玉先後參與其事，編纂的時程極為冗長，在定稿之前，萬斯同、王鴻緒都先後都撰有稿本，亦即所謂「明史稿」。近人楊家駱考校發現，《古今圖書集成》所錄《明外史》傳記，「其文多與王鴻緒據萬斯同稿改撰之『明史稿』先後二本合，而往往加詳」，復以「陳夢雷於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完成《古今圖書集成》，當時王鴻緒史稿尚未成書」，因此，《古今圖書集成》所援用的《明外史》，應該就是出自萬斯同手中的「明史稿」。至於《古今圖書集成》（亦即萬斯同《明史稿》）與今本《明史》關係若何、是否能夠在相當程度上釐清《明史》的編纂過程，茲舉元末明初經學家汪克寬(1304-1372)的傳記為例：

汪克寬

按：《明外史·儒林·汪克寬傳》：「克寬，字德一，祁門人。祖華，受業雙峰饒魯，得勉齋黃氏之傳。克寬生而穎異，十歲時，父授以雙峰問答之書，輒有悟於聖學。乃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習，恍然知爲學之要，尚勤異於凡兒。後從父往浮梁，問業於吳仲迂，益篤志於聖賢之學。元泰定中，有司舉應鄉試，遂中選。及會試以答策切直見黜，慨然嘆道之不行，棄科舉業，盡力於經學。《春秋》則以胡安國爲主，而博考眾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易》則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禮經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四方學士，聞聲嚮慕，執經門下者甚眾。至正間，蕪、黃兵至，挈家避之深山，室廬貲財盡遭焚掠，自是簞瓢屢空，晏如也。太祖戡定徽、婺，克寬始返故鄉。洪武初，遣使以禮幣徵至京師，同修《元史》。書成，將授官，固辭老疾。乃賜銀幣，給驛還。五年冬，卒，年六十有九。」（〈經籍典〉，卷355，頁1742b）

汪克寬，字德一，祁門人。祖華，受業雙峰饒魯，得勉齋黃氏之傳。克寬十

⁶ 衣若蘭：〈從萬斯同《明史》稿到四庫本《明史》〉（臺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明代典籍研讀活動」報告，2004年3月12日）。

歲時，父授以雙峰問答之書，輒有悟。乃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習，專勤異凡兒。後從父之浮梁，問業於吳仲迂，志益篤。元泰定中，舉應鄉試，中選。會試以答策伉直見黜，慨然棄科舉業，盡力於經學。《春秋》則以胡安國爲主，而博考眾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易》則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禮經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四方學士，執經門下者甚眾。至正間，蕪、黃兵至，室廬貲財盡遭焚掠，簞瓢屢空，怡然自得。洪武初，聘至京師，同修《元史》。書成，將授官，固辭老疾。賜銀幣，給驛還。五年冬，卒，年六十有九。（《明史·儒林傳·汪克寬傳》，卷 282，頁 7225）

上述兩段文字，一則出自《古今圖書集成》，一則出自今本《明史》，《古今圖書集成》所錄而以「。」為識者，是與今本《明史》文字全然相同者。通過比對可以發現，兩本的文字雷同性幾達百分之九十，《明史》根本就是自《古今圖書集成》所徵引的《明外史》簡化修整而成。據此而言，說《古今圖書集成》的確能提供清初官方整理明代史料的實情與進程，絕對是可以成立的。

其二，「傳經名儒列傳」凡三十三卷，登錄了歷代一千一百八十位經學家的傳記，而所收各單一朝代的經學家人數則如下表所述：

朝代	周	秦	漢	魏	吳	晉	宋	齊	梁	陳	北魏
人數	6	2	242	11	8	41	8	10	26	19	43
朝代	北齊	北周	隋	唐	五代	遼	宋	金	元	明—清初	
人數	23	10	23	114	17	2	165	5	67	338	

儘管收錄於《古今圖書集成》當中的歷代經學家傳記，其文獻價值無甚特殊，但是「傳經名儒列傳」羅列了歷代一千一百八十位經學家的傳記，數量為歷來類書之最，對於有心從事經學研究的學者來說，可謂極其便利。筆者以為，「傳經名儒列傳」的資料架構，不但證明了《古今圖書集成》的確是探析傳統中國文化的重要媒介，對於經學研究的深入性而言，也頗具推進之功。

其三，對於宋代諸多兼通文學與經學的學者，「傳經名儒列傳」僅列其名字於卷前目次當中，並未確實採錄其傳記，其中原因為：

宋世如歐陽修、司馬光，一代名儒也，其於經籍撰述亦甚富，而〈本傳〉不

暇詳及，故無可採。今〈歐陽全傳〉已載〈唐書部〉、〈司馬全傳〉已載〈通鑑部〉，故但列其名於前，以備名儒之目。其他名儒，宋代尚多，皆以〈本傳〉未載傳經事，故不復錄，非遺忘也。（〈經籍典〉，卷 345，頁 1686a）

顯然，「傳經名儒列傳」甚或《古今圖書集成》的編輯者，在廁列資料之際，確實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這個現象或許又可以證明《古今圖書集成》的確是值得學者留心參酌的重要類書。

（四）藝文（卷 361-362，頁 1768b-1779a）

「藝文」所收史料為與經學相關的單篇散文與韻文，包括了帝王詔書（如漢武帝〔劉徹，156-87 B.C.〕〈置五經博士詔〉）、儒臣奏議（如盧植〔?- 192〕〈上諸經解詁疏〉）、學者傳贊（如班固〔32-92〕〈董仲書傳贊〉）、經術策問（如張九齡〔673-740〕〈明經對策第三問〉）、經學辭賦（如文彥博〔1006-1097〕〈經神賦〉）、經學歌賦（如文彥博〔1006-1097〕〈經神賦〉）、經著序跋（如洪邁〔1123-1202〕〈跋白虎通德論〉）、學者魚雁（如朱熹〔1130-1200〕〈答滕德章書〉）、經學纂記（如黎持〈京兆府學石經記〉）、經學歌詩（如呂希哲〈經筵大雪不罷講二首〉）等項。

事實上，歷代關於此類的詩文數量極多，「藝文」僅收錄八十七篇，的確顯得九牛一毛。同時，選取這些篇章的標準為何，「藝文」也未作說明，可以說是一大缺失。

（五）紀事（卷 363-365，頁 1779b-1791b）

「紀事」所收史料頗為特殊，收書的範圍則遍及經、史、子、集。所謂特殊，是相較於「傳經名儒列傳」而言。凡是人物行跡與經書經學相涉，而其情事無關乎經書大義、學術風氣、學業傳承、著書立說者，置之「傳經名儒列傳」則顯得零碎，則收錄於「紀事」，例如：

（《漢書》）〈蓋寬饒傳〉：「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為郡文學，以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

（《漢書》）〈諸葛豐傳〉：「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經籍典〉，卷 363，頁 1780a）

《後漢書·顯宗孝明皇帝紀》：「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帝生而豐下，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建武十五年封東海公，十七年進爵為王，十九年立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經籍典〉，卷363，頁1780a）

上舉三例，兩則記載士人「以明經為郡文學」，一則記載漢明帝「十歲能通《春秋》」、「學通《尚書》」，與經書經學幾無關涉，是「紀事」一類中最为為常見的典型，嚴格地說，對於學者研治經學並無助益。

（六）雜錄（卷366，頁1792a-1796a）

「雜錄」一項所錄資料，性質與「總論」所列頗為近似，然其針對性與完整性一如「紀事」之於「傳經名儒列傳」，是以鳩集相類文獻，另設此項。如其中收錄宋邵博（?-?）《河南邵氏聞見後錄》關於王安石（1021-1086）《三經新義》貽誤學子的記載（〈經籍典〉，卷366，頁1793b），由於記述內容零星不成體系，與其他項目萬難相容，是以置於此類。

（七）外編（卷366，頁1796a）

「外編」所收僅兩則，一則出自晉葛洪（284-363）《神仙傳》、一則源於晉干寶（?-336），所述內容涉及神怪靈異，與其他類別絕不倫類，因而另置於此。

三、〈經學部〉徵引圖書略述

〈經學部〉卷數多達三百一十七，當中屬於編輯自我論述者，可以說是微乎其微，鈔撮徵引自歷代典籍者，則占了絕大部分。若以純粹鈔撮的方式建構如是巨量的文獻組織，援用的典籍必然為數頗豐，諸多受錄的典冊書籍，是否為最適當的材料，其文獻價值又如何，都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關於〈經學部〉徵引典籍的狀況，以下便先依類分項敘述（「藝文」徵引單篇散文韻文不列統計）：

(一) 經部

書名	作者	存佚	備註
禮記	〔漢〕戴聖編次	存	
韓詩外傳	〔漢〕韓嬰	存	
春秋名物考		未見	
易學授經圖	未詳	未見	《經義考》載《授經圖》有三，除明朱西亭《授經圖義例》之外均已亡失，〈經學部〉所引傳《易》譜系（〈僑庇傳〉）與《授經圖義例》所述大致相同，而文字差池，未審出自於何處。
白虎通	〔漢〕班固等	存	
六經奧論	〔宋〕鄭樵	存	
			計六種

(二) 史部

書名	書名	存佚	備註
史記	〔漢〕司馬遷	存	
漢書	〔漢〕班固	存	
後漢書	〔南朝宋〕范曄	存	
三國志	〔晉〕陳壽	存	
晉書	〔唐〕房玄齡等	存	
宋書	〔梁〕沈約	存	
南齊書	〔梁〕蕭子顯	存	
梁書	〔唐〕姚思廉	存	
陳書	〔唐〕姚思廉	存	
魏書	〔唐〕李延壽	存	〈經學部〉徵引稱《北魏書》。
北齊書	〔唐〕李延壽	存	
周書	〔北齊〕魏收	存	
南史	〔唐〕李百藥	存	
北史	〔唐〕令狐德棻等	存	
隋書	〔唐〕魏徵等	存	
舊唐書	〔後晉〕劉昫等	存	
新唐書	〔宋〕歐陽脩等	存	

舊五代史	〔宋〕薛居正等	存	〈經學部〉僅錄書名，不引內容。
新五代史	〔宋〕歐陽脩等	存	〈經學部〉僅錄書名，不引內容。
宋史	〔元〕脫脫等	存	
遼史	〔元〕脫脫等	存	
金史	〔元〕脫脫等	存	
元史	〔明〕宋濂等	存	
明外史	〔明〕萬斯同等	未見	即今本《明史》初稿。
前燕錄 (別本十六國春秋)	〔北魏〕崔鴻	存	〈經學部〉徵引即《別本十六國春秋·前燕錄》(卷3, 頁7a-7b,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引文稍有刪節。
唐國史補	〔唐〕李肇	存	
五代春秋	〔宋〕尹洙	存	〈經學部〉於五代經學家傳記部分, 全以《五代春秋》所述為準。
真宗實錄	〔宋〕晏殊等	佚	原書本佚, 〈經學部〉徵引《真宗實錄》兩則, 內容與《玉海》所載相同(卷42, 頁48b; 卷52, 頁42b;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而文字略有刪節。
明朝開天紀	〔明〕佚名	未見	〈經學部〉所引《明朝開天紀》(太祖)、《明肇運紀》(成祖)二篇, 明、清各家書目均未著錄, 所引與《明實錄》事同而詞異, 今本《明史·本紀》則幾乎全然未載, 二篇或許亦是《明史》初稿。
明肇運紀	〔明〕佚名	未見	
明朝紀事本末	〔清〕谷應泰	存	
列朝詩集	〔清〕錢謙益	存	
萬姓統譜	〔明〕凌迪知	存	
闕里志	〔明〕陳鎬	存	
江都鄉賢錄	未詳	未見	
梓潼士女志	〔晉〕常璩	佚	輯存。
高士傳	〔晉〕皇甫謐	存	
英雄記鈔 (漢末英雄記)	〔魏〕王粲	佚	輯存。
計三十八種			

(三) 子部

書名	書名	存佚	備註
莊子	〔周〕莊周	存	
荀子	〔周〕荀卿	存	
韓非子	〔周〕韓非	存	
新語	〔漢〕陸賈	存	
新書	〔漢〕賈誼	存	
淮南子	〔漢〕劉安	存	
新序	〔漢〕劉向	存	
法言	〔漢〕揚雄	存	
論衡	〔漢〕王充	存	
鹽鐵論	〔漢〕桓寬	存	
潛夫論	〔漢〕王符	存	
孔子家語	〔魏〕王肅	存	
神僊傳 神仙傳	〔晉〕葛洪	存	
搜神記	〔晉〕干寶	存	
拾遺記	〔晉〕王嘉	存	
群輔錄 (聖賢群輔錄)	〔晉〕陶潛	佚	輯存。
小說	〔南朝〕殷云	佚	〈經學部〉徵引見《太平廣記》卷一六四，魯迅《古小說鈞沉》亦錄其文。
顏氏家訓	〔北齊〕顏之推	存	
中說	〔隋〕王通	存	
集賢注記	〔唐〕韋述	佚	〈經學部〉徵引全見《玉海》(卷52, 頁27a,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王氏談錄	〔宋〕王洙	存	
皇極經世書	〔宋〕邵雍	存	
邵雍外書	〔宋〕邵雍	存	
夢溪筆談	〔宋〕沈括	存	
程子遺書	〔宋〕程顥、程頤	存	
續明道雜誌	〔宋〕張耒	存	
容齋隨筆	〔宋〕洪邁	存	

朱子全書	〔宋〕朱熹	存	
近思錄	〔宋〕朱熹編	存	
曲洧舊聞	〔宋〕朱弁	存	
野客叢談 (野客叢書)	〔宋〕王懋	存	〈經學部〉徵引均稱《野客叢談》。
畫墁錄	〔宋〕張舜民	存	
捫蝨新話	〔宋〕陳善	存	
聞見後錄	〔宋〕邵博	存	
南部新書	〔宋〕錢易	存	
東軒筆錄	〔宋〕魏泰	存	
鼠璞	〔宋〕戴埴	存	
丹鉛總錄	〔明〕楊慎	存	
見聞錄	〔明〕陳繼儒	存	
太平清話	〔明〕陳繼儒	存	
焦氏筆乘	〔明〕焦竑	存	
雨航雜錄	〔明〕馮時可	存	
蝸笑偶言	〔明〕鄭瑗	存	
日知錄	〔清〕顧炎武	存	
錦堂庭訓錄	未詳	未見	
傳經錄餘話	未詳	未見	
傳經堂餘論	未詳	未見	
			計四十七種

(四) 集部

書名	書名	存佚	備註
薛瑄文集	〔明〕薛瑄	存	
王鏊文集	〔明〕王鏊	存	
續詩話	〔宋〕司馬光	存	
			計三種

(五) 方志

山西地區			
山西通志	長治縣志	夏縣志	臨汾縣志
山東地區			
兗州府志	濟南府志	堂邑縣志	壽光縣志
四川地區			
四川總志			
江西地區			
江西通志	吉安府志	南昌府志	建昌府志
臨江府志	撫州志	南昌郡乘	上饒縣志
安福縣志	宜黃縣志	泰和縣志	進賢縣志
萬安縣志	臨川縣志	廬陵縣志	
江南地區			
江南通志	江寧府志	池州府志	松江府志
揚州府志	蘇州府志	太倉州志	丹陽縣志
休寧縣志	江都縣志	江陰縣志	江陰縣志
吳江縣志	吳縣志	武進縣志	祁門縣志
金壇縣志	長洲縣志	青田縣志	宣城縣志
涇縣志	高淳縣志	華亭縣志	婺源縣志
溧陽縣志	嘉定縣志	歙縣志	
京畿地區			
真定府志	容城縣志	無錫縣志	
河南地區			
河南通志	永城縣志		
浙江地區			
浙江通志	台州府志	金華府志	處州府志
嘉興府志	寧波府志	上虞縣志	山陰縣志
仁和縣志	平湖縣志	海鹽縣志	嘉善縣志
鄞縣志	餘姚縣志	歸安縣志	蘭谿縣志
括蒼彙紀			
陝西地區			
陝西通志			

湖廣地區			
衡州府志	彬州志	公安縣志	江陵縣志
益陽縣志	黃陂縣志	零陵縣志	
福建地區			
閩書	福建通志	漳州府志	福寧州志
候官縣志	晉江縣志	莆田縣志	連江縣志
廣東地區			
廣東通志	歸善縣志		
			計九十二種

(六) 政書、類書、目錄

書名	書名	存佚	備註
唐會要	〔宋〕王溥	存	
冊府元龜	〔宋〕王欽若等	存	
通志	〔宋〕鄭樵	存	
文獻通考	〔元〕馬端臨	存	
續文獻通考	〔明〕王圻	存	
玉海	〔宋〕王應麟	存	
崇文總目	〔宋〕王堯臣等	佚	輯存。
中興書目	〔宋〕陳騭等	佚	輯存。
國史經籍志	〔明〕焦竑	存	
圖書編	〔明〕章潢	存	
續書目	〔明〕陳氏	未見	〈經學部〉多次徵引陳氏《續書目》，然未詳何人。
經義考	〔清〕朱彝尊	存	〈經學部〉徵引為初刻本。
			計十二種

據初步統計，〈經學部〉徵引的典籍數量多達一百九十八種（「藝文」則收錄散文韻文計八十七篇），其中經部六種、史部三十八種、子部四十七種、集部三種、方志九十二種、政書五種、類書一種、書目六種。而在進行數量的初步統計以及約略地分析了這典籍的屬性與作用之後，可以建構以下認知：

其一，就數量來看，〈經學部〉引書重史部，輕經、子、集三部；就篇幅來看，史部的文獻也著實占去大部分卷帙。之所以會出現如是狀況，固然是因為〈經

學部〉當中的「傳經名儒列傳」大量羅列了各部正史與方志資料，而取材角度有所偏失，則是另外一個肇因。就學者傳記的騰錄來說，分布於某些文集當中的人物傳記，往往都較正史當中的相關載錄詳盡而確實，假若能適時援引，那麼史料的呈現將更顯完備，《古今圖書集成》忽略了這些面向，單純地只鈔錄正史以及方志中的相關傳記資料，不但限制了資訊包容性，也使得〈經學部〉的基本文獻架構顯得偏頗。除此之外，歷代名臣文集當中，往往收羅了大量與國家政策相關的詔議奏疏，而這些文類之中，每每包含與中央政府經學政策相關的內容，其中若干更是正史未見收容的，〈經學部〉在「彙考」的第一部分，僅只援用了歷代正史與《唐會要》、《冊府元龜》、《玉海》等書，忽略了這些重要資訊，致使文獻闕缺自不必言，同時也造成了取材偏頗的現象。

其二，〈經學部〉徵引的書籍當中，有若干業已亡佚（見上列各表），設若內容為諸家輯佚未得，隱逸難見者，則《古今圖書集成》於文獻保存整編，居功厥偉。然而據筆者查察，〈經學部〉援用的諸多佚書，大多可於前人的著述當中尋獲蹤跡，倘使全書情狀都如〈經學部〉所展現的，那麼《古今圖書集成》保存古文獻的功能，自然不如前代古注與類書。

其三，〈經學部〉徵引了九十二部方志中的相關資料，數量不可不謂龐大，其中江南地區二十七部、浙江地區十七部、江西地區十五部、福建地區八部、湖廣地區七部、山東地區四部、山西地區四部、京畿地區三部、河南地區二部、廣東地區二部、四川地區一部、陝西地區一部。單就數量來看，〈經學部〉所表徵的，似乎是一個以江西、江南、浙江為中心的經學發展狀況，距離這個中心愈遙遠，那麼所呈現的數據就愈稀少，設若陳孟雷等人的編鈔，的確是出自完整的檢閱與整理之後，那麼如是的表現，似乎就可以充當討論經學研究風氣發展的依據。另一方面，〈經學部〉所引用的方志，有少數用於表述宋代學者的生平，絕大多數則用來呈現明代至清初學者（如萬斯大）的事蹟。合兩者觀之，〈經學部〉所徵引的方志史料，似乎說明了經學研究於明代在廣義的「江南地區」已然卓有拓展，將於有清一代在徽、吳、皖、蘇、浙地區發揚恢弘的事實。

四、結 語

《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經學部》篇幅多達五十六卷，文獻涵蓋

七大類別，收書一百九十八種，倘若能確實掌握，對於擴展研究層面，必有襄助。然而，面對其中琳瑯滿目的眾多資訊，研讀者所該秉持立場與先決認知若何，以下數項或許可為參酌：

其一，就文獻保存的角度來看，〈經學部〉所徵引的史料篇幅雖多，但由於成書時代晚近，援用典籍現今存留者多，所以內容欠缺珍貴或者獨特性。因此，學者使用這些資料，宜抱持初階查閱的態度，視之為學術基本知識建構的媒介，如此方能賦予《古今圖書集成》正確的定位。

其二，〈經學部〉所徵引的文獻，從四部分類的角度來看，過度著重史部而輕經、子、集，又重於古人而輕於近代，資料結構難稱健全，結構極度傾斜，學者於檢讀之際，宜有所洞悉，慎勿受其牽引，認為文獻結構本當如此，而貽誤了探本窮源以及廣採博收的時程。

其三，雖然〈經學部〉所援引的文獻並無特出之處，學者也很難就其內容探得新議題或拓展新範疇，然而「彙考」條列了歷代帝王的經學措施，「傳經名儒列傳」臚列了歷代一千一百八十位經學家的傳記，數量之多堪稱歷代類書之最，對於有心從事經學研究的學者來說，可以說頗為便利。筆者以為，〈經學部〉所收史料的豐碩與齊備，不但證明了《古今圖書集成》蒐羅多方，是探析傳統中國文化的重要媒介，對於經學研究的深入性來說，也頗具推進裨益之功。